

看翻译

季羡林谈

季羡林 著

典藏本

季羡林先生亲自授权 审定本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季羨林谈 翻译

季羨林
著



季羨林先生亲自授权、审定本
典藏本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谈翻译(典藏本)/季羨林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54-0555-1

I. ①季… II. ①季…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7875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黄 珊
责任编辑 黄 珊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洞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0 印张 2 插页 13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翻译	1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7
谈翻译	10
再谈翻译	15
翻译的危机	19
汉语与外语	25
大学外语教学法刍议	43
新世纪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47
佛教梵语研究	49
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51
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	55
cīnī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58
再谈 cīnī 问题	68
《罗摩衍那》译后记	71
《沙恭达罗》译本序	85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103
《南亚丛书》序	104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106



研究语言要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108
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118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34
关于外来词	143
中外两种竹枝词	145
漫谈古书今译	147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150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156

翻 译^{*}

翻译 (translation) 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 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 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 例如文化背景不同, 题材不同, 语言难译易译不同, 读者不同等等, 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 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 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 欧洲文明源于翻译, 上至罗马帝国, 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 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 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 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 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 2000 年来的犹太基都教文化就不会产生, 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 将近 2000 年来, 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 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 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 忒奥克里托斯 (约公元前 310~ 前 250)、卡图卢斯 (约公元前 87~ 前 54)、普卢塔克 (约公元 46~120 或 127) 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 阿拉伯译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 如维

^{*} 此文系 1986 年 2 月 22 日季羨林与许国璋所合写。——编者注



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伽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Original 或 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

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余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绣，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绣），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马建忠(1845~1900)强调译事之难。梁启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译之高明。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1853~1921)在几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译中遵循的原则。在《天演论》序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那些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他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他对本书“繁赘而无关宏旨”的地方,则又有所删除。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说:“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可以看出,《天演论》是意在达旨的述译,《原富》是辞义无所颠倒的严译,《群己权界论》是不依文作译的宽译。但是不论译法如何,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译,努力用

新的词或词组以求词义的全部传递。例如 evolution 中文没有与之相应的词，于是采用“天演”一词；libehdy 这个法制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于是用“群己权界”这一词组。严复对于西文词义的翻译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开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件，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



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比较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以及翻译的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也讨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是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直译与意译问题，也偶尔涉及；但不是重点。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才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一、翻译；二、变换；三、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绝不可能有变换。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所谓文与质者就是。这是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因此谈翻译技巧多，而谈抽象理论少。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解决具体作品和文句的译法问题将提到日程上来。

1986年2月22日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

^{*} 本文是季羨林为《中国翻译词典》写的序，现标题是编者所加。——编者注

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

谈翻译

题目虽然是《谈翻译》，但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谈翻译》。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晏子春秋·内篇》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譬如说，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绘的细

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其实味不同”。

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橘树再移远一次。可惜晏子没有告诉我们，这棵树又化成什么。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抗议，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



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无论对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著者和译者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上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